



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年

〔苏〕瓦·布尔加科夫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年

〔苏〕瓦·布尔加科夫 著

萨石 赵坤曾 宗玉才 黄雪珍 译

赵坤曾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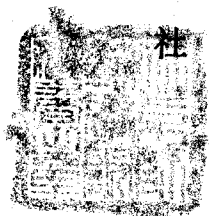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6646

1126646



ВАЛЕНТИН БУЛГАКОВ
Л.Н.ТОЛСТОЙ В ПОСЛЕДНИЙ
ГОД ЕГО ЖИЗНИ
ДНЕВНИК СЕКРЕТАРЯ
Л.Н.ТОЛСТ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年

[苏]瓦·布尔加科夫 著

萨石 赵坤曾 宗玉才 黄雪珍 译

赵坤曾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插页2张 381,000字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统一书号:11203·072 定价:3.45元

007411

译 者 的 话

关于布尔加科夫这部日记的价值，本书前言和注释的作者、苏联著名的托尔斯泰研究专家罗扎诺娃已从历史的角度向我们作了权威的说明。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当会引起我国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和喜爱托尔斯泰的读者的兴趣。

在世界文学的长河中，尽管群星璀璨，但真正称得起“泰斗”、“顶峰”如托尔斯泰者，实亦屈指可数。托尔斯泰的一生、他的创作实践、思想探索、巨著宏论，乃至日常言行，真可说是“浑涵汪洋，千汇万状”。他的世界观之复杂，在古今中外的文豪中也是极少见的。高尔基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托翁晚年，各种矛盾纠缠集结，越来越趋激化，以致八十二岁高龄弃家出走，溘逝荒站。这一千古悲剧的始末，布尔加科夫在他日记中都作了客观、详实的叙述，而对于悲剧发生的原因及其症结所在，读者看完“前言”之后不难接其要领。

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如实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位温良恭顺、矛盾重重、自责甚深、忧思难解的老人形象。人到暮年似乎易走极端，爱说过头话，虽伟人亦所难免。在本书中我们多次读到托尔斯泰否定科学、艺术以及人类文明一切成就的言论，他认为凡是高级的文化形态都是为富人所用，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其实这正好

反映了他的宗法观念和情绪。这在托尔斯泰身上始终是一贯的，统一的，并非如某些论者之所谓“两个托尔斯泰的矛盾”或“精神上的二重性”云云。托氏晚年还力主禁欲与素食，忌杀生而至于羞着皮鞋、怜悯苍蝇的地步。此等细节看似荒唐，实则是他道德自我修养的身体力行，将其宗教信仰进一步推向极端。然而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土地私有制的抗议与揭露，也变得更为勇敢，更加激烈了。凡此种种，只要我们把握住列宁分析托尔斯泰矛盾的主要论点，即托尔斯泰反映了宗法制下的农民的力量和弱点，则诸般疑虑都将迎刃而解。

罗扎诺娃的三万余字的前言，实际是一篇极好的论文，对我们研究这部资料，了解托尔斯泰的复杂矛盾，定能有所帮助，望读者勿以篇幅较长为倦。

下面谈谈原文的版本问题。我们在翻译此书时，曾仔细比较了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两个版本，发现后者在注释部分作了若干补充，而对前言的某些字句亦略有调整，遂决定以修订版为据。正文部分，两种版本基本一致，仅有两处一九五七年版有而一九六〇年版无。其一，九月二十六日日记有这样一段：“过一会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又来了，说她并未烧掉契尔特科夫的相片，而是‘准备把它烧掉’。又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她又来了，手里拿着一把被她撕毁的、她所憎恨的那张相片的碎片。”在这段文字下面，一九五七年版还有一句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的话：“我这就把它扔到茅坑里去！”其二，十月三十日日记中之第四自然段后，一九五七年版尚多这样两节：

“顺便说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同谢尔盖延科的谈话中提到卡卢加一个与我同姓的当地地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已经得知此人为富不仁，欺压农民）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这里也有个布尔加科夫。不过这一个跟那一个可不一样！’”

托尔斯泰逝世后不久，布尔加科夫将其日记以《于托尔斯泰生命最后一年在托尔斯泰身边》为书名于一九一一年首次出版，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二〇年又两次再版。由于当时种种原因，作者在这些版本中作了某些省略和回避。后来这些省略和回避的部分曾在报上、并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一九五七年的版本除将日记正文盡量补足外，适当删去了一些与托尔斯泰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一九六〇年版除开上面指出的情况，其余均无异样。

日记涉及的专名和事件甚多，为使读者方便，作者布尔加科夫、序言作者罗扎诺娃和译者均加了大量注释。在译本中，作者布尔加科夫加的注释标明“布注”，序言作者罗扎诺娃加的注释标明“罗注”，译者加的注释标明“译注”。原文中“罗注”附在书后，译本中每条“罗注”移至相应页的左下角。有些“译注”是参考原文书后的专名索引做出的。本书翻译分工如下：原书前言，2月22日至6月20日——萨石；作者的话，1月17日至1月22日，8月10日至11月7日，译者的话，全书总校——赵坤曾；1月23日至2月21日——宗玉才；6月21日至8月8日——黄雪珍。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译文和译注中难免有谬误失当之处，请读者不吝指正。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

目 录

原 书 前 言..... 罗扎诺娃(1)

作 者 的 话..... (49)

日 记..... (53)

原 书 前 言

有关托尔斯泰的回忆录一类的著作卷帙浩繁，名目众多。作家的同时代人所留下的几乎每一页材料都蕴藏着某种东西，都能丰富我们对这位“十九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①的认识。在这类浩繁的著作中，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占有引人注目地位。

布尔加科夫跟托尔斯泰一起度过了作家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是充满痛苦的煎熬和紧张事件的一年，其时多年来一直折磨着他的那些矛盾已缠为死结并导致了悲惨的结局。这种情况无疑使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具有特殊的意义，其独到之处和价值也正在于此。托尔斯泰在其日记中写了很多关于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探索和沉思。可是托尔斯泰是为自己写的，而且有时强调“只为自己一个人”写的，因此很自然，在他的日记中缺乏那种充分的描述和对自己生活的外部情况的注意，这些情况只有旁观的见证人才能描写出来。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托尔斯泰娅这一年所做的详细笔记已为众所周知。然而由于她的病态，她只能看到那些与她个人的命运和支配她病态意识的猜疑直接有关的事。在著名音乐家

① 见《高尔基文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1，第14卷第307页）——罗注

戈利坚维伊泽尔教授的《在托尔斯泰身边》一书中，有大量关于托尔斯泰这一阶段生活的材料。然而与布尔加科夫不同，戈利坚维伊泽尔只是拜访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那里的客人，这一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也反映到他的书中。在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的手稿部还藏有一些未发表过的材料：托尔斯泰的朋友、志同道合者、医生杜尚·马科维茨基的笔记（他用速记法把从托尔斯泰那里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和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的女友、打字员费奥克利托娃的日记（整个一九一〇年她都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所有这些已出版和待出版的材料都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因为只有从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中，从大量事实的比较中，才能更正确地了解伟大作家的人格，了解他的生活悲剧。

现在出版的这本日记的作者布尔加科夫，在他代替被沙皇政府流放的托尔斯泰的秘书古谢夫的职务时，还非常年轻。由于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很大，又崇拜他的权威，所以他力求尽量完整和准确地把他有机会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记入自己的本子中。在他的日记中极其认真地再现了伟大作家的思想和言论，再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宅子里的气氛和日常生活，列举了许多来访者、客人和朋友。布尔加科夫的记事使我们现在还能够历历如见地想象出作家所生活的那个天地，理解他的精神状态，探究他许多作品的产生过程，与他一起体验他生活中最痛苦的一页。

读了布尔加科夫的日记，能使人很具体地领会到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人的形象；尽管生活了那么长的岁月，工作紧张而劳累，内心又十分痛苦，这种力量也永不枯竭。布尔加科夫展示出，托尔斯泰即使在垂暮之年还是那样一位不知疲倦的劳动者。他在自己的集子

《每日格言》和《人生的道路》上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时间、关注和每日不辍的劳动。他孜孜不倦地考虑材料的选择及其分类原则。他数十次改写《人生的道路》集子的前言。在这个前言中他阐述了自己人生观的基本原则。即使在最后一年，也象以往的年代一样，作家经常体验到真正的创作激情，一气呵成短篇小说《无意间》的草稿，一天之内写出了完全符合托尔斯泰高度现实主义精神的短篇小说《霍登惨案》。政论文章、宗教-哲学论文集、剧本、讽世短剧、中篇小说，这就是托尔斯泰八十岁以后的创作范围。

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帮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多方面的智慧和性格。我们看到在工作中和休息时的托尔斯泰，在写字台前和棋盘旁的托尔斯泰，在成人和孩子们中间的托尔斯泰。布尔加科夫日复一日描叙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让我们看到托尔斯泰是怎样与人民密切联系着的，复杂而困难的国家生活又是如何渗入到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隐居生活中来的，而他则不间断地、敏锐地注视着国家的生活。所有这一切使布尔加科夫的日记成为珍贵的资料来源，这些资料对研究托尔斯泰最后一个阶段的传记是十分有益的，必不可少的。

布尔加科夫日记以《于托尔斯泰生命最后一年在托尔斯泰身边》为书名于一九一一年作家死后不久首次出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几乎俄罗斯首都所有的报刊对此书的问世都给以肯定的评价。

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二〇年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两次再版。在这些版本中，还非常明显地使人感觉到作者的“托尔斯泰主义”，他对伟大艺术家世界观中不健康的反动方面的崇拜，对作为导师、宗教传播者的托尔斯泰的虔敬。布尔加科夫本人在日记中占有很大篇幅。他是托尔斯泰忠实的、始终不渝的学生，把自己所有的空间时

间都用于写作阐明托尔斯泰宗教观点的《基督教伦理学》一书。日记的这些版本中，还存在一个作者自己也指出来的重大缺点。布尔加科夫在此书第三版的前言中坦率地说，由于日记出版时几乎所有与作家生活最后一个阶段的悲剧事件有关联的人都还健在，他认为对很多事应该避而不提。作者在这个前言中写道：“至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生活中的和他的家庭中的一些事件，过早地把它们公诸于世可能会触及这些事件某些参与者尚未愈合的伤口，无意中给他们带来痛苦，所以如第一版的读者所知，我当时是有意识地没有这样做的。如果说七年前不能讲的许多事情比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准备出走，写遗嘱，有关手稿的争吵，出走时的情况，给妻子的最后几封信等等，这些没有变成俄国报刊乃至全世界报刊的财富的话，那末现在我同样也不愿承担宣扬别人各种家庭隐私的责任。当然，叙述这些事件和事实是应该有一个限度的，同时又不能违背对于如今还健在的当事人不容忽视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前一个版本出版时不得不遵照的。读者定能理解书中仍还存在的那些迫不得已的省略和回避的动机，并对此加以原谅。”^① 这些省略和回避之处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公布于众。一九二八年这些补充的部分以单行本形式发表，题名为《列夫·托尔斯泰的悲剧》。现在这个版本中，把补充了很多新材料的上述单行本的内容，加进了日记正文，并且作了某些删节和文字上的订正。作者删去了与托尔斯泰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以及那些在更大程度上是描述布尔加科夫本人、他的情绪和他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东西。然而日记中仍然存在那些托尔斯泰的“学生”和追

^① 见布尔加科夫著《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莫斯科，1920，“大家族”出版社，第111页）——罗注。

随者所写的几乎一切回忆录都有的缺点，即以同样的兴趣和注意力来对待伟大艺术家思想的伟大表现和他思想上的弱点、迷惘及错误。

整个说来，日记给读者提供了有关作家最后几个月生活的生动而有趣材料，提供了对弄清托尔斯泰社会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弄清他的美学爱好和兴趣及导致他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悲剧的珍贵而可靠的资料。



象所有的伟大艺术家一样，托尔斯泰任何时候也没有使自己的生活动人民的命运分开。为千百万俄罗斯农民的悲惨、可怕的命运感到痛苦，对如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奴役地位始终不渝的关心，产生了作家全部思想上的探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托尔斯泰的哲学和社会观非常复杂和矛盾，但贯穿他整个自觉的一生的却“只有一个主导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支配着他，无论他是在自己寂静的书房中工作、与贵族客人谈话，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周围散步，还是在人民中倾听他们的议论。即使在耄耋之年，托尔斯泰仍在专心致志地苦苦思索这个问题。这个折磨人的思想还在青年时期就在他的意识中产生了，它迫使他离开大学，回到自己的庄园，度过了给他带来那么多失望的“地主的早晨”。

这个思想的内容是：制度极端的不合理，在这种制度下一小撮寄生虫占有全部土地，过着游手好闲、无忧无虑的生活，与此同时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小块土地上，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用力不胜任的劳动来养活奴役和压迫自己的人。无论在政论文中、在私人信件中、在不公开的日记中，托尔斯泰都反对这一“极大的罪恶”，这一思想以不同的方式贯串于他的一切艺术作品中。这个思想支配

着托尔斯泰，给他带来了真正的痛苦，就是在布尔加科夫所描述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也是如此。

“在这位伯爵之前，文学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庄稼人。”^①这一准确而深刻地表达出托尔斯泰创作及其人品的实质的说法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从布尔加科夫这本描述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托尔斯泰的日记也可以看出，虽然托尔斯泰属于贵族特权阶层，但在他的爱憎和对事物的看法中，却反映了俄国农民的观点。他用农民的眼光来看世界和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以他们的名义谴责现行社会制度；他的力量和弱点、他的伟大的反抗和苛求精神、他的谦逊与宗法思想的局限性，都源出于农民。

托尔斯泰的新任秘书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仅仅呆了几天，就已感觉到把托尔斯泰与他的其他家庭成员分隔开来的那个界线，并发现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和托尔斯泰与其周围人的深刻分歧。布尔加科夫写道：“用茶时，大家热烈地谈论起来，谈爱国主义，谈外国比俄国优越的地方，最后谈到土地、地主和农民等问题。这个问题，正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幢白色房子的大饭厅里最后经常要谈到的话题。”而且，倘若没有这所房子的男主人——在这个圈子中只有他思考和想到那些无权坐到餐桌旁发表自己意见的人们的需要，——那么这些谈话就会与当时其它贵族庄园里进行的许多谈话类似了。“苏霍金夫妇和谢尔盖延科指出农民对地主和一切老爷们的无比憎恨。”托尔斯泰的儿子安德烈·利沃维奇证实说，“俄国的庄稼汉都是胆小鬼！”他亲眼目睹“五名龙骑兵挨个鞭打一个村子的四百多户村民”。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说：“农民都是酒鬼，他们完全不是由于地少才贫穷的。”然而，只

^① 见《高尔基文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2，第17卷，第39页）——罗注

要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住房的大厅里一出现，就会响起他那正直、勇敢的声音，这是一个脱离了自己周围成见的人的声音，这是一个眼前浮现出近在咫尺、生活无着、备受掠夺、因贫困而愚钝的庄稼汉形象的人的声音。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地”说：“假如农民有了土地，这里就不会有这些愚蠢的花坛了……就不会有这些每月付给仆人十个卢布的庸愚之人了。”这些话中蕴藏着巨大的深刻意义。这些话意味着，倘若土地归农业劳动者所有，那么就不会有地主私有者阶级及其寄生生活和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奢华了。

布尔加科夫的日记清楚地表明，经常与农民接触对托尔斯泰来说是多么迫切的需要。由于经常到农民中间去，与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谈话，设身处地地体验他们的思想情绪，使托尔斯泰深信：土地不应成为某人的私有财产，而应归全民所有，它能给人民面包和自由。托尔斯泰在与布尔加科夫“谈到农民生活令人发指的贫困及人民中的愤怒情绪”时，直接引用了他从一位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嘴里听到的话作论据：“昨天我又遇上了那个曾经和我议论过土地问题的庄稼汉。他想有一块土地，呆在它上面，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根本不愿替地主干活，因为所有一切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才不好好干活，甚至酗酒。”

托尔斯泰经常集中注意力反复地思索，如何满足俄国农民的这一要求，如何消灭现行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交人民使用。

托尔斯泰在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理论中找到了避开革命和农民骚动实现土地国有化的途径。托尔斯泰跟着亨利·乔治断言说，实行“统一土地税”就会使土地逐渐成为能够靠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人的“财富”，那时土地奴隶制和“富人对穷人的权势”

就会消失。在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中，读者将会看到，托尔斯泰不仅赞同亨利·乔治的观点，而且认为他是反对土地奴隶制的孜孜不倦的斗士。在他看来，亨利·乔治是最合理、最现实地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的提出者。

托尔斯泰的宗法农民观点，使他的世界观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在他的世界观中，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反动的乌托邦幻想结合在一起。托尔斯泰在保护和捍卫俄国农民最迫切的需要的时候却没有能看清楚，他如此宣传的亨利·乔治实际上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他的方案无非是“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①然而，同样是这种农民观点决定了托尔斯泰对沙皇政府的土地政策和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改革的深刻否定。从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极其关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颁布的旨在改变俄国农村整个发展方向的土地法令。这是一道形式上给予所有农民自由脱离村社的权利，实际上是极其反民主的法令。经受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冲击的尼古拉二世政府，企图用这一法令在农村牢固建立富农阶层，并消除新的革命动荡的可能性。“斯托雷平政府想怎样来改造旧的农村秩序呢？”弗·伊·列宁写道：“它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住地主的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去成立田庄’，兼并尽可能多的村庄的土地。”^②

托尔斯泰不能不看到，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与千百万农民为敌的，它带有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对私有者的支持。他敏锐而正确地猜到了，在斯托雷平法令的那些民主条款背后，隐藏着把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35年版，第27卷，第140页）——罗注

② 见《列宁文集》（第16卷，第330页）——罗注

小撮农民变成富裕的私有者、为所有其它群众的无地和贫穷辩解的“狡猾政策”。一九一〇年托尔斯泰在短篇小说《梦》的一个稿本中表示了自己对斯托雷平这种企图的谴责。“我们再也想不出象十一月九日法令这样的东西，这个法令破坏了古老的俄国村社的基础，破坏了人民认为土地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观念，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人民破产，使他们受到土地绝对私有制的诱惑。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拥有一万俄亩^①土地的伯爵大人可以对只有五俄亩土地的农夫说：你有五俄亩，我有一万俄亩，我们同样都是私有者。”^②在任何情况下，当谈到沙皇政府的新土地政策时，托尔斯泰都坚持这样的观点。他对佩舍霍诺夫^③的小册子《新旧份地占有制》甚表赞许，因为在这本书中他找到了对自己观点的印证，找到了说明斯托雷平改革对俄国农村破坏性影响的材料。

在密谢尔斯克村契尔特科夫家作客时，托尔斯泰在与农民谈话中警告他们不要分出去成立田庄。“这样做坏处很多。”托尔斯泰对他们说。有一次偶然碰到自己的亲戚奥鲍连斯基公爵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谈到了十一月九日的法令，倘若考虑到奥鲍连斯基作为地方长官的地位，这可是个非常微妙的话题。奥鲍连斯基讲，据他的观察，分出去成立田庄的农民对自己的新处境感到很满意；他还顺便提到，不久前他们还到他那里去过的一位英国人，利物蒲大学教授表明了这一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回答道：‘从物质方面看，这对分化出来的人可能会好一些。然而对所有的农民来说是更坏了。上帝的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原则被

① 1俄亩 = 1.09 公顷。——译注

② 见《托尔斯泰全集》（第38卷，第451页）——罗注

③ 见四月二十八日注释。——译注

破坏了……英国人喜欢这样，可是我这个俄国人不喜欢。”

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中还有不少其它令人信服的事实，揭示了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积极的一面。在托尔斯泰周围的人及常到他家去的人之中，可以看到国务会议的成员和国家杜马的代表。^①米·亚·斯塔霍维奇、瓦·阿·马克拉科夫和米·谢·苏霍金^②把杜马辩论的激动情绪、议会斗争的激烈气氛带到了托尔斯泰家中，他们讲述了急风暴雨的杜马会议上的各种详情细节。然而托尔斯泰并不同意他们的见解，他不相信杜马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对它抱怀疑讥讽的态度。布尔加科夫引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谈话，它表明托尔斯泰的洞察力和看来他在亲近的人中很孤独。

“‘怎么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不是对您说过，普利什凯维奇搞的这场丑剧将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吗？’今天早上米·谢·苏霍金碰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时说，‘霍米亚科夫辞职了！……’

‘难道后果很严重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问道。

‘那还用说！杜马主席……’

‘那不都是一样吗？霍米亚科夫辞职了，会有某一个托尔比亚科夫来代替他。他们都是一路货色。’”

在托尔斯泰对杜马的态度中，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敏锐感。他总是捍卫被压迫者的利益。布尔加科夫讲：“我提到国家杜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确信不移地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国家杜马带来极大的害处，因为它起了转移人民视线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他

① 国务会议为沙俄最高立法机关，其成员一半选举产生，一半由沙皇委派。国家杜马是代议机关，根据四类不平等的选民团（地主、市民、农民和工人）实行间接选举。对于国家杜马来说，国务会议是上议院。——译注

② 米·亚·斯塔霍维奇，见三月六日注释；瓦·阿·马克拉科夫，见三月六日注释；米·谢·苏霍金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大女婿。——译注